

※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

「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前言

楊晉龍*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專研中國傳統經學文獻的同人，有感於長期以來經學研究者「重遠輕今」的不自覺傾向，因而開始注意清代以來經學相關研究的推展工作，於是有一九九八年七月開始，三年半完成的「清乾嘉學派經學研究計畫」，探討了乾嘉學派學者的經學成就；接著又有二〇〇二年起開始執行，為期五年的「晚清經學研究計畫」，探討了嘉慶以後到民國之前約一個世紀(1821-1911)的這段時期，常州、湖湘、廣東、浙江、四川等五個清代經學較為發達地區，涉及經學研究的表現。總共利用八年半的時間，結合海峽兩岸及國外的學者，對清代乾嘉以來到清朝滅亡之間，經學較為發達地區的學者，尤其是那類以往並沒有特別受到重視的學者，在經學各方面上的表現，進行了較為實質性的全面梳理。

清代經學研究計畫結束後，由於考慮到民國以來，政治制度的改變，空間觀念的擴大，世界觀的轉換，再加上西洋學術傳入的交流功能與競爭關係，整個中國的社會與學術環境已經和清代大大不同，最終也就形成了幾乎瀰漫整個中國的「反古」理性啟蒙思想，還有追求歷史真相的「疑古」思潮。這些重大的學術環境與思想的變局，就成為「必專守舊」且「宜述古而不宜標新」的經學¹，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就一般的狀況而論，學術研究方法誠然可以隨時「伸手拿來」試用，無論試用結果合不合拍，至少隨時性的與日俱新的可能確實存在。但傳統學術的內容和精神這種質性的內涵，由於與古老文化根深蒂固地緊密結合成為一體，就比較難以具有隨時性的變異能力，即使轉變也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因此民國建立前後，

* 楊晉龍，本所副研究員、本專輯負責人。

¹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註：《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139、頁277。原文各作：「凡學皆貴求新，惟經學必專守舊」、「經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等。

雖然內有復古思潮的新文化建構者的強力破壞，外有西洋現代文化的無形強勢壓逼，以及教育制度與教導方式的改變²，誠然對經學原有的價值與研究產生強大的影響，但其中依然還是有不少「不敢竄亂舊文」的「篤實者」在³，因此雖不至於穩如泰山地毫不受影響，但卻也並沒有在短時間之內，完全改變整個原本依附存在於社會的經學思想與研究，至少在國民政府專政的時代，經學的舊學術思想與研究，固然沒能維持類似傳統中國那般「獨霸」的地位，但還是能在當時「復古」新文化思潮的強力攻擊壓逼下，維持其某部分的特殊地位與活動空間。這可以從教育部在民國元年廢除小學讀經後，直到民國二十四年社會上還在熱烈討論是否「讀經問題」，並且絕對地「反對」或「贊成」者勢均力敵，而有條件地「贊成」者佔大多數的實況⁴，以及當時出版的經學相關著作數量龐大等等⁵，獲得部分可信的證明。然則民國以來經學研究內涵與方法上的實質變化如何？新思潮與舊思想在經學研究上的消長變化如何？當該也是經學史、學術史，甚至思想史等研究，值得探討的重要學術問題。基於此一學術上的基本認識，因此文哲所同人在執行「晚清經學研究計畫」後，接著又設計了一個自二〇〇七年開始執行的「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的計畫，目的是探討「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1912-1949)」、「國民政府在臺灣時期(1945-2004)」及「新中國建立時期(1949-2004)」等三階段，不同政治時空下經學研究的實際狀況，每個階段預計花費兩年的時間研究，所以這是一個為期六年的研究計畫，希望透過此項研究計畫的完成，可以比較清楚且完整地將民國經學和清代經學之間的關係釐清，或者還能因此而了解傳統中國學術如何轉化成為現代學術的因緣，於是可以提供給相關研究者比較有效的答案。

² 教育制度改變之事，有關經學排除在正式課目之外，楊晉龍：〈論兒童讀經的淵源及從理想層面探討兩種讀經法的功能〉，《（高師大）國文學報》第8期（2008年6月），頁71-120「二、『經』的意義及讀經運動的興起」一節，有較詳細的討論。有關新式教育課程以文學為重的狀況，可參考李宗剛：《新式教育與五四文學的發生》（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一書的相關討論。

³ 〔清〕紀昀等編，王伯祥斷句：《四庫全書總目·天文鬼料竅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110，頁937。原文作：「蓋儒者講求古義，務得源流，稍篤實者，皆不敢竄亂舊文。」

⁴ 這可以參考《教育雜誌（讀經問題專號）》第25卷第5號（1935年5月）專輯的討論。

⁵ 據林慶彰先生告知至少在一千種以上。此或可參考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1901-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所收相關條目。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8年）等收錄之書。

我的專業主要在明代詩經學、四庫學及治學方法等的研究，偶爾也注意傳統教育思想上的問題，不過最近幾年來，則主要將重心放在經學擴散滲透進入其他非經學論著、宗教典籍文本進入經學詮釋系統，還有宗教人士或以宗教思想詮釋經學典籍等等的狀況，並進而利用前述實際存在的狀況研究經學史，以彌補以往經學史相關研究者偏向於以專書或名家為研究根據，導致研究成果因而出現以偏概全或脫離實際的不足問題，因此並沒有直接參與「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計畫的執行。之所以未直接參與「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的計畫，主要是由於先前已蒐集探討過國民政府遷臺後五十年來臺灣學者研究《詩經》的狀況⁶，於是在這個基礎上向國科會申請了兩個連續性的研究計畫：「二十世紀前臺灣詩經學史的研究」(NSC 96-2411-H-001-048-MY2)及「二十世紀臺灣詩經學研究」(NSC 98-2410-H-001-079-MY3)，希望透過藉用經學擴散滲透表現以研究經學史的方法，探索《詩經》在臺灣社會表現的狀況，這兩個為期共五年的研究計畫都幸獲通過，故無暇再參與「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的計畫。思考規劃「二十世紀臺灣詩經學研究」計畫之際，首先注意的是臺灣大學師長輩們研究《詩經》的狀況，於是有探討屈萬里先生(1907-1979)的《詩經》研究成果，以及其對臺灣研究《詩經》的學者影響狀況的探討⁷。在研究屈先生的過程中，發現為文評介屈先生《詩經釋義》的何定生先生(1911-1970)⁸，同樣也是臺灣大學中文系早期講授《詩經》課程的老師，何先生還出版有《詩經今論》和《定生論學集：詩經與孔學研究》兩本論文集，但翻查相關文獻資料，有關何先生事蹟的記載卻相當有限⁹，詢問師長們也所知不多，因而激起探詢之心。恰

⁶ 楊晉龍：〈詩經學研究概述〉，林慶彰主編：《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頁91-159。

⁷ 楊晉龍：〈開闢引導與典律：論屈萬里與臺灣詩經學研究環境的生成〉，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等主編：《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年），頁109-150。

⁸ 何定生：〈「詩經釋義」評介〉，《學術季刊》第2卷第1期（1953年9月），頁136-138。

⁹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的記載是：民國38年8月「新聘何定生為講師」（頁14）、43年8月「何定生講師升等為副教授」（頁19）、55年8月「何定生副教授升等為教授」（頁32）、59年7月「何定生教授離職」（頁41）等。按：臺灣大學留存的何先生人事資料上，蓋有「59.8.3 在職病故，應予註銷服務名籍」之印，以及何夫人至今還住在臺大宿舍的事實，可知何先生並未離職，此載其離職當是筆誤，依體例當移至59年8月下，作「三日，何定生教授逝世（享年六十歲）」。

巧此時政治大學中文系的車行健教授也注意到何先生的《詩經》研究，並且有意進行研究探討，因而蒐集有何先生早期編著的《詩的聽入》和《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兩書，以及何先生繳交給臺灣大學的〈簡歷〉，同時他還在二〇〇九年元月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得知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的曾志雄教授，係何先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非常親近的學生，並且正在寫一篇探討何先生研究《尚書》文法的文章。更不可思議的是二〇〇八年十二月間，李爽學的研究助理陳如玫小姐，有天中午在本院活動中心前的馬路上遇到我，突然問我知不知道臺大中文系有位何定生教授？原來何先生的長公子何光慈先生與如玫在同一個教會，最近剛從美國回臺灣，閒聊之際提到父親為臺大中文系教授，如玫因此纔隨意問我一下，這時候纔知道原來何夫人一直住在臺灣大學的公家宿舍，位置就在新生南路紫藤廬的後方。於是透過陳如玫的介紹、聯繫與安排，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和平東路的教會，帶著李媛媛同學訪問了何光慈先生及何夫人王淑儀女士；接著在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再與車行健教授、張素卿學妹及葉致均同學等在紫藤廬，訪問了從美國紐約回到臺灣的何先生女兒何念貽小姐，何小姐後來還將珍藏在美國家中的何先生「日記」寄回臺灣，提供我書寫何先生〈學術年表〉時參考。另外再透過車行健教授而與香港的曾志雄學長取得聯繫。於是在大家有志一同的共同努力下，「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竟是如此神奇般地誕生，毋怪信仰堅定虔誠的陳如玫要大喊「感謝主」了！

「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收錄的七篇文章，主要包括學術與人格兩大範圍。何光慈先生與何念貽小姐的文章，有助於了解何先生平日私人生活的狀況；張兆安醫師的文章，可以看到何先生教導與關懷學生公共生活的側面，這是屬於人格風範的部分，兩者大致可以知道何先生身為父親、教師與基督教徒的一面。曾志雄學長的懷念文章，可以看到何先生對學生在學術研究上的引導；車行健教授、徐其寧同學的〈論著目錄〉與〈師生情緣〉等兩篇，曾志雄學長的《尚書》文法的論文，以及我的〈年表〉，大致可以看到何先生的學習過程與學術的表現，這是何先生作為大學教授與學者的一面。何光慈先生、何念貽小姐及張兆安醫師三人的原稿中，記載有許多涉及宗教信仰上的見證與事蹟，由於與《通訊》的性質不太符合，故而曾加以必要的刪改，還請三位作者見諒。(2010/06/08)